

第一章 不知所措的人类

“人类疯了 往墙上撞!”要是略微设想一下未来 人们大都有此共识，当然我们说的是比下届选举或本世纪末稍稍远一些的未来。而企业领袖、工会负责人、政界人士或是底层的无产者，无论他们是左派还是右派，私底下也都是这么想的。每个人都努力着，仿佛这是他的职责，不遗余力地维护他所在阶层、所管理的企业、所领导的国家的利益，亦或仅仅是他家庭的利益。可是与此同时，他又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会给这场全球性的灾难雪上加霜。在正往下沉的泰坦尼克号上，是否还有必要花大力气去争取一个好一点儿的船舱呢？

为了不让自己失望，有勇气的人立即采取了逃避的做法，日子一天天过去，用帕斯卡的话说，他们变得消沉起来。犬儒主义者所做的无非是不要小孩，并且建议所有的人都来步他们的后尘，以免将来被自己的命运吓倒；也有神志清醒者乐于扮演卡桑德尔 的角色 宣称灾难即将来临 尽管他们不大可能言中。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仿佛这是一场宿命，他们无从逃避。

卡桑德尔（Cassandre, 1901 ~ 1968）法国美术家、舞台设计师及画家。

——译注

如果这种悲观的念头不过是一种假设：明天，或者再晚些，那么人们就不会再去想它了。这不过是无所事事的学者们玩的一场游戏，这些人喜欢让自己浑身发抖并充分享受灾变说带来的快乐。他们的论据归结为一条简单的形式上的推论：数千年来，不断有人宣告世界末日的到来，或是范围小点儿的灾难，或是人类文明的终结，每一次这样的预言都被证明是错的，这次，它又错了一回。

这和坐在吊篮里从 30 楼往下吊的大厦清洁工是一回事。他在经过第 29 层的时候还提心吊胆的，因为有人告诉他，若不小心摔一跤可是会要命的。但是，慢慢地，他逐渐放下心来，经验告诉他，没什么大不了的。微风拂面，惬意依然，等重新回到了一楼，他就彻底平静下来。

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别再混淆视线了：究竟是什么力量牵引着人类走向这个世纪的尽头？

第一节 人口的空前膨胀

人口的首要特征就是数量。这半个世纪以来人口数量的发展已经显出严重失衡的迹象。一度由自然界牢牢掌握的人口开始失去控制，其造成的后果将一直延续到下个世纪末。

人类的自然繁殖力相对较弱，新生儿的死亡率也很高。数千年来，出生和死亡之间存在着一种近乎完美的平衡，它使人类既得以继续繁衍，又不至于出现灾难性的过量繁殖。公元初年，

整个地球上只有两三亿的人，到了公元 1000 年，还是这么些人。

后来，这种平衡被打破了，我们自己也曾有节制人口增长，可是不断提高的降低婴儿死亡率的技术却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若任其自生自灭，一年之中只有不到一半的新生儿能够存活，这么看来，控制增长几乎是不必要的了：今天，在发达国家人口中，儿童所占的比例仅为 1/150。人口数量的增长起初是很缓慢的 第一个 10 亿人口大关的突破在 19 世纪初 第二个出现在 1930 年前后。打那以后，就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在过去 全球人口花了 20 个世纪的时间才翻了 3 倍，也就是从奥古斯都国王^①到拿破仑一世时期，而现在，仅仅一个 20 世纪，就已经翻了 3 番。到 2000 年，全球人口总数将突破 60 亿。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等待人类的只有灾难。幸好，它开始减速了。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努力降低人口出生率；下个世纪后半叶，全世界的人口数量将达到最顶峰。大约在 100 亿至 110 亿左右。但是，人口的控制需要全人类的积极努力，也就是说，富国要给予穷国有力的支持。

人类正经历着全新的发展。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没有任何以往的经验可以借鉴。从前那些化险为夷的招数如今派不上一丁点儿用场。我们得自己摸索，探寻出合适的做法，来适应这些从未遇见过的情况，它们的特点是难度不大，变化却很快。

变化的速度通过全球人口数量翻倍所需要的年数可见一

奥古斯都(Augustus 公元前 63年 ~ 公元 14 年)，古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

——译注

斑。在 19 世纪，人口经过 100 年才翻了一倍，20 世纪上半叶，总共用了 65 年；70 年代则只用了 35 年。不断缩短的增长周期终于打住了：今年（1994）翻倍的时间又延长到了 45 年。咱们可以设想，到下个世纪中叶这一周期将无限地延长，也就是说，“零增长”最终还是有望实现的。

人们希望其他国家能通过较尊重个人自由的方式达到控制生育、降低人口增长速度的目的。大家都知道，这其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对年轻女性进行教育。统计结果表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比她们的母亲生的孩子要少。一项在摩洛哥进行的研究得出了以上的重要结论。在摩洛哥高中以上学历的年轻妇女每人育有不到两个孩子，而仅受过初级教育的年轻女性却和她们的母亲一样，有五个以上的孩子。是教育造成了这样的状况。人们以往的观念是为了自己的家族、种族，或者民族的利益而生育，新一代的父母已不再这么想，他们把孩子的命运放在首要的位置来考虑。他们不再从所在阶层的利益出发去生儿育女，而是从孩子自身的利益出发。

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要尽快降低出生率，并把人口总数控制在一个较低的范围内，当务之急是在所有国家都建立起一套对男生和女生同样切实可行的教育体制。大部分人口增长呈“脱缰”形势的贫穷国家都会对此积极配合，问题是它们没有办法实现它。

可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却有的是办法。这里就有一个简便的方案，它能让所有国家都受益：让富国替穷国出这笔建立教育体制的钱。这么做的目的显然不在于让穷国接受富国的制约。每一种文化都应当对教育的客观性负完全的责任，教育不

是强制性的灌输，而应该是面对真理的开放态度，是敢于向未知世界作出最初尝试的勇气。教育是让人找到自我的方式，也是让人学会自控的途径。人要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类的一员，因此，应当由人类共同承担这笔费用。

我们发现能这么做的组织半个世纪前就有了。如果所有成员国都参与这样的行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能重新焕发出活力。唉，可眼下最富有的国家实行的政策却与之相反，它们以政治上的分歧为借口，缩减对穷国的资助。这真是利己主义自取灭亡的好例子。

无论人类怎么努力，那些苍白无力的统计数据却告诉我们，要想把人口控制在 100 亿以内是不大可能了。鉴于咱们对如此庞大的人潮毫无经验，大家难免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并要求各方各面的专家们集中他们的全部学识来回答：人类生存的宇宙是否容得下这么多人？

人们通常会不自觉地换个方式提问：地球养得活这 100 亿人吗？

专家们一致的回答是：是的。只要我们能更好地利用土地，更有效地阻止土地沙漠化，少浪费点儿资源，让粮食的供求得到平衡。说到浪费，就不能不提到一些富国的饮食消费习惯，它们消费大量的肉制品，为此耗费数量庞大的谷类制品来喂养牲口，回报却极低。其实只要减少肉类的消耗就能缓解农产品资源的短缺。

但是，人们只是就人类需求的一个方面提出这个问题的。当然啦，传统型的农民，像从前的欧洲农民或是“南半球”国家的

农民，没有向地球索取过任何东西；相反，发达国家的居民却比他们要求的多得多。地球得向他们提供石油、木材、稀有金属，这种种资源都是地球无法再生或者再生十分缓慢的。同时还得向他们提供无数个大型“垃圾桶”来处理他们制造的堆积如山的生活废品。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地球能养活多少像今天的西方居民那样消费的人吗？答案当然只能是个大概的数据。美国学者和法国学者分别对此进行了估算，得出的答案是相同的：怎么算也不足 7 亿人。如果再不彻底、迅速地转变生活方式的话，人类将要演绎的悲剧就全在这几个数字里了，数字的枯燥无情不容你多作想像：现在我们有 50 亿的人口，再过一个世纪可能翻一番，而按照普通西方人的方式吃喝享用我们这个星球所拥有的资源只够不到 10 亿人，而且几乎全世界的人都还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过上那样的生活。

这可叫我们如何是好呀？

第二节 人类能力的空前飞跃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联想到当代人类的另一个特点：能力的极大提高。在各个领域，无论是对我们观察到的周遭事物或是对这些事物的改变，我们都有办法对付，而这些办法在不到一个世纪以前我们连想都不敢想。人类进步的神速使我们习惯地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今天的不可能到了明天就会成为例行

公事。这种对科技无限发展的信任，很容易地就被当成确切的事实。如此说来，随着科学或技术的发展，任何问题将来都会迎刃而解。然而这份信任恐怕是太天真了：人类的能力是空前提高了，可它应付得了空前庞大、数量惊人的人口吗？

人类指望将来从地球那儿得到的资源，地球可能没法儿满足他们了，人们就想出了一个十分简单的计划：离开这个星球，移民到一个更舒适的星球上去得了。现在，我们一天就能在巴黎和纽约之间跑个来回，这即便是儒勒·凡尔纳也想不到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设想一下跨星际的旅程呢？

可惜呀，这样的举动受到一些时空条件的制约，特别是以下的事实：任何物体都不能自己移动，而任何一种信息的传送速度都不可能比光速更快。这可不是区区几个技术上的成果就能跨越的门槛；我们眼前确实摆着的障碍来自于我们生存发展的宇宙空间，况且星与星之间相隔的距离是那么遥远。就算是光子，这些光的小粒子，也需要 4 年的时间才能到达离我们最近的那颗星——半人马座的比邻星^①。

在银河系的星球当中，拥有行星的并不多见，有着和地球相似特征的行星就更罕见了。要想找到一颗距地球 100 多光年以内的备用行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只要想一想首批被派去摸底的探险家归来时的情形，就足以让我们果断地放弃这个梦想了。

怎么，又打起太阳系行星的主意了？那就让我们来认识一

^① 比邻星（Proxima Centauri），半人马座中最暗的子星，是距地球最近的恒星。——译注

下它们吧。我们可以在一些行星上建设几座永久性空间站，但跟在地球上比起来，这些空间站不大可能独立运转。少数人可以到那儿定居，靠专门的交通工具维系与人类的交往，可是要想让整个地球都上那儿去居住则是行不通的。

我们的考虑应该从这样的事实出发：人类是地球的囚徒。鉴于地球的现实条件，人们应当就地解决问题，尽量利用有限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们大可不必为这件事感到忧伤，仿佛遭到了命运的打击。恰恰相反，它给了我们展示想像力的机会。

就算到了一个人间天堂，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或是到了另一片能满足我们一切需要的土地上，但是在共同生活当中，我们也还是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是选择对抗，还是友爱；是相互歧视，还是紧密团结。这些问题在地球上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变得非常尖锐了。我们很晚才明白过来，今天所面临的困难是从何而来的。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清醒地认识现状，要客观地分析我们因满脑子幻想一时冲动而造成的后果。虽然我们通常不愿意承认，但今天的局面的确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我们以为世界上的人是永远不会灭绝的。然而时值今日 正如保尔·瓦莱里^①所说“世界末日到了”。

《创世记》的作者早就隐约预见到了这一结局，书中造物主说：“生长繁衍吧，布满整个地球。”3 000 年过去了，我们有理由

^① 瓦莱里 (Valéry, Paul Ambroise 1871 ~ 1945)，法国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译注

相信地球有一天真的会“装满了人”。这个注定了的悲剧似乎应该是很遥远的，不会马上给我们带来什么问题。可是现在，它离我们却非常地近，要求我们不得不彻底改变行为方式。

这位作者还补充了一条命令：“去征服地球吧！”这条指示听上去可太不切实际了。宇宙万物都得服从自然界的规律：石头被扔出去就会往下落，动物没东西吃就会饿死，人作为被创造出来的生物只能默默地承受附加给他们的命运，又岂能与老天对着干呢？

哪一天我们真的“布满”了地球，离“征服”它也就不远了。几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人类通晓了不少自然界的规律，也能够应付自如了。但是，面对每年数百万的人死于天花，我们却一直痛心疾首而又无能为力。我们一度把那些病毒控制得很好，它们被保存在实验室密封的试管中，已经消失了18年之久。人类一直都是疾病的受害者，例如苯丙酮尿症^①，它从我们的生命尚在孕育时起就存在于我们体内，并按照特定的组合随我们一起生长。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破译这种组合并让症状自己表现出来，甚至一些宇宙间的事也能够被改变。假如有一颗小行星可能坠落到地球，并严重干扰地面气候，我们会发现它，预先算出它的轨道并将其改变以避免这场危险。

这一切看起来就像人类刚刚从童年进入成年阶段，从一个它只能接受命运安排的时期进入了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时期。我们正经历着人类特有的危机——青春期。

苯丙酮尿症（Phenylketonuria），一种先天性代谢异常。——译注

因此我们应当选定一个目标，从现在开始采取行动，努力向目标进发。

首先，“生长和繁衍”的人类必须控制自己的数目。这个数目应该是地球承受得了的。

局面是如此混乱，以至大部分负责社会道德的部门，特别是教会，反应总是不够及时，过去它们对许多有益于人类的要求就缩手缩脚，而后呢，又跟人们定的目标唱反调。

一旦这个合理的要求得到实施——这在一个世纪以后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一起来决定，让我们具有的能力发挥应有的作用。既然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就得想清楚：我们究竟是什么？我们想变成什么样？该给人类定一个怎样的目标好呢？

第三节 人的不平等

关于这个目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非常容易达成共识，至少他们口头上是这么说的：应当尊重人的权利，也就是说，要让每个生命的尊严得到尊重。这些权利的最初表述是随意的：它们出现在那些率先介绍真理的文章中，这些文章证实了假设的真理的真实性，或出现在某些哲学家的著作里，它们被当成人类的一线曙光。

现在，我们总算可以清楚地得知这些关于世界、关于我们自己的权利。事实上，我们看到人类的特点，就是每一个集体都能

让它的成员自觉地产生成为“人”的意识。这一意识的产生并不是成员个体的特征，而是所有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特征：这种相互作用表现在各种不同形式的交流所产生的许多相同点上。

集体的主要功能就是组织这些交流，以便调动个人的积极性，这只有当个人获得与他人同样的地位时才能办到。

我们假设人们时常挂在嘴边的获得平等与尊重的理想，有真正被严肃对待的片刻。随即，那些平时享受优越生活条件的社会福利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们就得迅速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准。原因很简单，今天地球上有 50 亿人口，明天可能就是 100 亿，西方普通居民消耗的资源，不管是不可再生的或是再生十分缓慢的，都大大超出了地球的自然承受能力。

有关的数据大家都很熟悉了，可是却没人注意过它们的结果：占全球人口总数 20% 的 10 亿人，消费了全部流动财富的 80%。这表明，富人，也就是北半球的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是穷人——南半球居民——的 16 倍。如果有根魔杖轻轻一点，平等的制度明天就建立了起来，那么，今天这些特权享有者们会看到他们的财物被四个人瓜分干净。当然，这样的奇迹没有半点出现的可能，但它仍然预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要想实现平等，大幅度缩减北半球国家的消费势在必行。

与此相反的是，西方社会却在日渐增长的消费中艰难地寻找解药，尤其盼着能找到解决失业的方法，这显然是一个幌子。西方最不愿干的就是抛开虚伪的面具。为自己选择了不断地增加消费，就等于让别人去承受由此造成的后果。那么我们只好承认，权利的平等不过是哲学家、空想理论家或诗人的美好愿望

罢了。务实的决策者们还得有些别的本事。他们必须是自由、有竞争力并且高效率的。从这样的逻辑出发，北半球可以帮助南半球也进入到增长消费的行列中来，当然纯粹是出于好意。可是这帮助的幅度还不能太大，否则地球失去生机的这一天到来得还要早。

想达到这样的消费增长就只能继续保持甚至扩大这两类人的差距。在资源分配上，贫与富的关系是 1:16 将来会变成 1:20 而后是 1:30、1:50……要多久这样的不平衡才能使它的受害者承受得了呢？

日复一日，他们对这一差距的耐心比他们获得的要少。他们在电视屏幕上看着挥霍无度者逍遥过活，而身边满是一无所所有的人为了生存而挣扎。他们在两样现实中左右为难，一边是诱人的生活，尽管对于他们是虚幻的；另一边则是沉重的生存包袱，他们丢也丢不掉的。对于前者吧，他们光看看图像就行了；这后者可跟他们及其周围的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也许某一天他们真的会聚集到一块儿，互相团结，组织起来，然后向富人的堡垒发起进攻。

他们忘记了彼此之间的争执，矛头指向共同的敌人——富人，对于他们的反抗，能采取的唯一手段就是暴力。对付这些可怜人的进攻，富国们可得仰仗它们强大的军火了。这些军火原本是为北半球国家之间的冲突预备的，如今为了和南边的那帮家伙保持一定距离，它们倒可以派上用场。也许这就是核武器拥有国令人费解地不断改进核武器性能的原因吧。

显然，这样的武器只能在两个核武器大国之间使用。摧毁

对方，自己也必死无疑。以法国为例，就很有必要问问：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有必要动用核武力？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就算敌人的坦克——假设这配备核武器的“敌人”是从东边来的——袭击了斯特拉斯堡、巴黎或布雷斯特，人们也决不会作出动用核武器的决定，因为他们知道，那将会在几个小时之内摧毁整个国家。

相反地，一个仅仅装备老式武器的国家，用几个百万吨级甚至千吨级的火箭就足以让那帮乌合之众乖乖听话。这样就可以用一场“干净、漂亮”的战争问心无愧地将敌人消灭于千里之外。

这么做是不是显得太无耻了？海湾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敌人只不过被当成需要消灭的抽象的实体，一个文明的民族会做出怎样极端的行为。美军坦克在行进途中活埋了许多伊拉克步兵，被问及时，负责人作了如下解释：用坦克比一个一个地杀死他们再将其掩埋来得快而且省，反正结果都一样。

也许人与人之间如此地相互憎恨是少有的，可是要维持富人与那些沮丧的、眼红的人之间的势力平衡，只有通过行动上的威胁和对暴力的无尽恐惧才能实现。

第四节 公民间的不平等

一切不定的因素都有相互制衡的可能。在国家内部，在那些处在资源阶梯顶端的人和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之间，前者一心要保住他们的特权，后者则梦想着能更多地分享资源。北半球

国家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不可否认地带来了高效率，这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得到了证实，可是它也正在迅速地进行深入的转变。上个世纪，资本主义的成功来自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资产阶级认为必须以此为起点来获取生产资料，以便令其有朝一日为所有人带来利益。的确，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得到了改善。

20 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意想不到的转变，完全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战争结束后，人们把重心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也就是说，用大批量生产来减少所需的人力劳动。可对工人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受到这些进步的影响，这时，充分就业还是不成问题的。

劳动生产率经过一个时期的迅速提高，发展速度自然会减慢。然而出乎预料的是，它反而加速发展了，并且是持续的，这主要归功于电子技术的发展。听从电脑指挥的机器人随处可见，它们占领了人的位置。它们从不生病，不参加工会，也没有情感。这样的竞争是不公平的。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机器取代了人，人没有用处了。

甚至不再有剥削工人的必要，只要开除他们就够了。解雇接替了剥削。

怎么能够想像，当许许多多的男人和女人被认为是“多余的人”时，社会还能保持风平浪静呢？

按照大家对人这个定义的理解，在其他人的看来，每个人都是家庭的一员：“想造人，首先得有人。”如此一来，没有人会是多余的。削减任何一个人对所有人都是一种损失。而对于这个不幸

被开除的人来说，他只得坠入失望的深渊。因为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叫人绝望的事了——感到自己的存在对任何人都毫无意义。

通过裁员来调整社会机制——也就是失业——对这个社会来说无异于见死不救。想保持社会的健康，关键应该杜绝裁员。

特大型城市郊区的发展，像在拉美地区，预示着所有大城市今后的模样。青年人呢，他们对未来毫无把握，只能在犯罪、卖淫、吸毒中懵懂度日。他们干的好事使得一些警察也做出了相应的创举 这些警察烦透了行动迟缓、效率低下的法院，他们舍“正统做法”而走偏门。采取暴力只会不可避免地挑起、延续、加剧暴力的发生。如今在里约热内卢，开汽车的人晚上碰到红灯都不敢停，因为怕一不小心就成为下一个被袭击的对象。这种事什么时候会轮到巴黎和伦敦的市民呢？

当罗马君主们受到基督教日益普及的威胁时，他们原以为只要将那些狂热信徒投进角斗场喂野兽问题就会解决。结果反而出现了更多的殉教者。镇压也适得其反，因为这些基督教徒都受到一种信仰的支持。这个信仰就算够强大、够令人生畏的了，可是，跟造成今天许多犯罪的罪魁祸首——绝望——比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国与国之间，大开杀戒的威胁或许能使有意反抗的国家按兵不动。在一国内部，特权阶级试图求助于国家力量。这种力量应该是随处可见的。它要起作用，离不开一个严密的为政权服务的信息网。信息科学提供的各式手段令罪犯无所遁形。为了维持太平的假象，市民们将付出的代价就是得一直忍受这样

的监视。要自由还是安全，人们必须作出选择，而选择的结果总是一样的。

乔治·奥维尔 早在 1948 年就设想了这样的一种状况，并描绘出人类 1984 年的样子。我们已经超过这个年份 10 年了，要是我们还算清醒的话，就会发现我们正走上苏联似的独裁之路。

第五节 经济主义

对那些因循守旧的人来说，这条道路看来是不可避免的。现在与它分道扬镳，再去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社会还来得及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就不堪设想了。只有人才能够想像出一个乌托邦并去实现它，以使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恐怕在很长时间内，甚至永远都做不到了。

行动起来吧，就当还不算太晚。要想改变历史的进程，首先得试着了解是怎样的体制将我们引入如今的歧途。如果只要描绘出某个坏蛋或是十恶不赦的魔鬼，有着我们无法破解的魔法，那倒容易了。事实可没那么简单，正是人们的一种错误逻辑把我们搞到这步田地的。

不要认为是我们的恶行招来神对我们的惩罚，或是自然界对我们的报复。是我们自己愿意听从外来的意愿。首先，我们

得拒绝逆来顺受，而后，就会有足够的意愿想得到一些东西。这是一种我们不擅长的经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而这正是我们应该揭露和谴责的。

在过去，关系国家发展方向的决策主要是由君主作出的。君主是国家的象征，他依据自己的判断，区分出对国家好与不好的事。他们最常追求的目标就是国家的强大。一个国家总是想要得到更宽广的疆域，更多的臣民。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历史，主要是由连绵不断的战争构成，就是这种对强大的欲望造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历史是国家的历史，而不是人民的历史，人民更多地成了这些冲突心甘情愿的牺牲品而不是受益者。

当然，这种状况还没有消失，不过一些国家已经在努力，至少在理论上，将决定权交给人民。经过了纷繁复杂的过程，某些国家确实做到了，咱们可以称之为民主国家。说实在的，它们的数量实在是少得可怜，在联合国 180 多个国家中，也就不到 20 个。统治者的目的不再是自身的强大，而是人民的福祉。甚至，要他们用强大去换取人民的利益也在所不惜，他们的出发点和态度都和前人不同：扩展疆域，吞并肥沃的土地或众多的臣民，这些都不再是挥之不去的欲念。

在国家的管理方面，君主的作用无疑比过去小得多了；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它仍以别的形式存在着。随着生产力和交流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几近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决策中心。对整个人类来说，一些大型多国公司扮演的角色至少和那些大国同样重要。它们的经营范围遍及各大洲，它们作出的决定关乎数亿人的喜乐。投资选择，待遇政策，不同工厂之间的产量分